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汉语史

简论

齐冲天 著
唐作藩 审定



大象出版社

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汉语史简论

齐冲天 著 唐作藩 审定

大象出版社

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

汉语史简论

齐冲天 著

唐作藩 审定

责任编辑 宋士杰

大象出版社 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码 450002)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5 印张 125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325 册

ISBN7-5347-2051-6/Z·86

定 价 7.45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袁行霈 吴同瑞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今天,当历史车轮进到 20 世纪和 21 世纪交替的年代,中国人民又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历史使命。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既有重重困难,也有种种有利条件。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宝藏,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美德教育,就是我们的一大优势。毫无疑问,普及祖国的历史知识,弘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向社会提供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将对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具有积极意义。有鉴于此,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大象出版社携手合作,共同推出“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北京大学具有研究和宏扬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和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一优势,学校领导于 1992 年初决定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心成立后,依托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系,组织各方面的教师和专家开展工作。一方面,致力于专深的学术研究,编辑出版《国学研究》年刊和《国学研究丛刊》;另一方面,注重于文化

2000-62

普及工作，“将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与有关单位合作制作的电视系列片《中华文化讲座》和《中华文明之光》，已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编写这套丛书是中心普及工作的又一尝试。中心希望丛书的作者们“眼界向上，眼光向下”，用大手笔写通俗性著作，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并重，力求深入浅出，使广大读者增长知识，陶冶情操。

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有精华也有糟粕，不加以区分不行；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曾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交流、碰撞与融合，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纵览古今、通观世界的眼光不行。我们抱着历史的态度、分析的态度、前瞻的态度、开放的态度，从事发掘与研究工作。这种态度也力求贯彻到本丛书中。然而，深入浅出地介绍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的选题只能侧重于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对那些目前尚未充分注意的学科如法律思想史等，也适当予以注意。

从选题和内容来看，这套丛书可分为文学、语言、历史、哲学、考古、法律、科技、中外文化交流等若干系列，每个系列都由研究中心聘请学术造诣较深的专家担任主编，每部书稿都经同行专家审阅。因此，中心不再对丛书作统一的审定工作。

大象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们非常重视这套丛书，把它列为重点出版书目，并为丛书的及时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辛勤的劳动，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丛书的策划、编写工作一定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一 绪论——汉语历史研究的回顾	1
(一)汉语历史研究的社会背景	1
(二)语义一直是过去汉语历史研究的重点	3
(三)朴学的学风	5
(四)东西方语言学的交流与普通语言学问题	7
(五)汉语史研究的观点与方法	10
二 汉语发展与我国社会	15
(一)汉语与我国社会共享繁荣	15
(二)约定俗成——语言的社会性	17
(三)社会条件是语言变化发展的外部成因	21
三 汉语的历史稳固性	26
(一)基本的音义体系早已存在	26
(二)最古老的语言成份和最新的语言成份并存,后者由前者派生	29

(三)稳固之中也颇有变化	33
四 一个显著的历史分界线——汉	41
(一)几个显著的标志	41
(二)大分界之下还可以有小分界	48
五 从文言到白话——书面语的历史	54
(一)文言、白话在长期对立中各显其能	54
(二)《史记》语言的文白分析	64
(三)近代社会的大变革促使白话取代了文言	75
六 书面语的载体——汉字的发展史	78
(一)汉字发展的内部规律	79
(二)汉字与书法——工具与艺术，永相伴随	90
七 汉语的音义结构概貌	95
(一)汉语音义结构的主要特点	96
(二)语音史和语义史的相对独立性	99
(三)谐声表——汉语音义关系史的谱系	100
(四)现存谐声表的两大不足之处	102
八 音系的历史图表	110
九 语义的引申与发展	122
(一)语义研究的回顾	122
(二)语义引申的一般原理	124
(三)语义引申举例	126
(四)语义引申的过程	131

十 词族	136
(一)传统词族举例	136
(二)新建词族举例	146
十一 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	153
(一)词类区别和语义	156
(二)句法和语义	158
(三)多音节词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	165
十二 词法和句法的发展	168
(一)词类的全面巩固与部分更新	169
(二)主语充实、明确化,谓语空前大 发展	177
十三 一个总结论和一些历史的推测、 辨析	185
(一)什么是汉语发展史的一个总结论	186
(二)什么是汉语书面语发展的主要 表现	187
(三)汉字的最大特征应该是什么	188
(四)什么是汉语词汇发展的大趋势	189
(五)什么是语法史的主要内容	190
(六)怎样衡量一种语言发展水平的高低	192
(七)单音节语是怎样产生的	194
(八)语言史的哲学	196
(九)音义关系和以音求义	198

一 绪论——汉语历史研究的回顾

(一) 汉语历史研究的社会背景

我国语言文字学的发展,若从东汉谈起,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如果说《尔雅》、《方言》还主要是一些语言资料的汇编,那么许慎《说文解字》已是一部对语言词汇和文字体系的内部规律作全面分析的语言学专著。它博大精深,是语言学的十分杰出的开创之作,以致后来整理和研究《说文》就已成了一门专门的大学问,称为说文学或许学。《说文》追究本义,分析文字的最初构造,都是汉语和汉字的历史研究。

在这之前,是语言学的史前时期,有大量语言解释方面的资料。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学者、思想家,作为思想的材

料、论述的论据，往往找点语源学方面的东西来谈谈。世界上恐怕各个民族的早期思想家都对语源学饶有兴趣。我感到其中最精彩的一条，就是《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太史克引周公作誓命中所说的“毁则为贼”，“毁则”就是破坏法令、原则。这个解释，好在准确地解释了“贼”字的本义，并切合它形、音、义的语源。《说文》：“贼，从戈，则声。”干戈不是对着敌人，而是对着国家的法则了，这便是贼。老子有所谓“国之贼”，孔子有所谓“德之贼”，都是这个意思，国家和道德都是有“则”的。它完全是一个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概念。我看，这就是《说文》解释本义、联系字形和读音这种方法的雏形。语源是典型的语言学及语言史问题，只是零星的构不成体系，《说文》对一万多字（正文九千多，重文一千多）的形、音、义作全面系统的阐述，这就非同小可，无疑是开创一门学问了。其中包含着语言的音义观、语言文字及其意义的发展观、音义分析的方法论等基本而系统的概念。

是什么力量开动和推进了汉语和汉语史的研究？自从秦国统一天下，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六七十个世纪的纷争割据局面，毁城池，通驰道，但是到汉代才稳住阵脚，开始了全面的封建社会的统治和发展。为了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此时许多先秦经书看不懂了，从中产生了古文经学派和今文经学派的斗争，两派各自对经书作不同的解释，究竟谁正确？这就不仅是政治问题了，就要开展古汉语和古文字的研究。汉语史问题的研究主要是由古文经学派来开展的，它要尊重历史，许慎师生等人都是古文经学派的杰出人物，要研究古汉语的本来意义，求得经书的真谛，科学地解决问题。

许慎就一个字一个字地钻研它的字形和本义，这确是深入而脚踏实地的研究工作，是充满开创精神的语言学奠基工作。语言学在社会文化中是一种基础性的学科，不像政治学、经济学、哲学那么迫在眉睫，所以，只有当文化发展要深入到基础性问题时，才提出语言学的研究课题来。之后的两千年，古典文献的阅读和解释始终是汉语史课题研究的动力之一。历史上，汉语的研究有两个高潮：汉和清。清代康熙、乾隆等对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十分推崇，开展了大规模的文化遗产整理工作，对古籍的注释、古汉语的研究、说文学和雅学的研究，做得空前深入，出现了乾嘉学派，成绩斐然。过去有些人认为这种成就是清代文字狱迫害的结果，这未免说得太消极、太片面了，像段玉裁、王念孙等都是献身于民族传统文化事业的人。汉、清两代汉语研究的高潮，都是以汉语历史研究为中心的。

（二）语义一直是过去汉语历史研究的重点

我国传统的语言学分文字、音韵、训诂三个学科，成就都是很高的。因为我们的文字是表音表义的，结合音义的研究就开展了文字学的研究。三者中以训诂学的著作最多，花的力气最大，所以我说，过去汉语史研究的重点是在语义方面。不过清代可说是文字、音韵、训诂作综合研究、全面发展的时期，形、音、义三者互相求，缺一不可。而所求的，主要是意义，兼及音韵和文字。

意义研究的经验是很多的。首先就是追本溯源，努力求其本义，由本义到引申义，由根词到派生词，顺着历史的脉络，就畅达而无所阻隔了。说来本义也是相对而言的，从有文字记载开始，我们所看到的是语言发展到那个时期的一个横断面，再往前的历史就知道了。所以，许多基本的常用字，它的音义是如何来的，就无法得知，我们只能从能知道的时期开始来看待本义。不过《说文》中有的本义也可以得到证实，如说“月，缺也”，是否可信？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文字和语音从月的字，具有残缺之义，如刖，绝也；𠂔，折也；𠂔，断足之刑；坠耳曰聃。而月的字形，也是个缺月之形。这样，从派生字追溯本义，从整体中看，月的意义从缺，就是可信的。

其次，研究语义要联系语音。也只有联系语音，才能确认本义，确认语源，也才能循此去寻求已经沉沦的语义或义素。语源研究，就是音义关系史的研究。汉代声训，积极联系语音，他们是直观的，因为那时还没有语音学。清代古音学昌明，音义结合的研究就大大提高了一步，从自发到自觉的了。

再有，对语义的灵活变化，段玉裁有浑言、析言的分析方法。浑言的时候，两词或两义可以不加区别；析言的时候，便有什么区别。这样就把意义交代得很清楚了。语言的诠释中还始终坚持引证实际用例，不作玄虚凭空之言。清代的朴学家都博览群书，熟读或背诵，并从广泛的用例中作精细的分析概括，往往还能结合社会生活。这在段玉裁是做得尤其踏实认真的，因此他的《说文解字注》中充满了精辟的语

义分析,创获非常丰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例,就是他辨析听、闻二词的意义区别。这是两个大家熟识的字,但是要谈它们的意义区别,却未曾有人说个清楚。他说:“往曰听,来曰闻。”仔细想想,果真如此,如说听诊器,窃听器,都是要积极去听的,就不能说闻;如说传闻、见闻,多是外来的,被听到的,就不能说听。

慨叹语义研究薄弱的人,忽视了我们语义研究中的智慧与成果。不过,这种感叹也有一定理由,即这种研究对庞大的语义史领域来说,还不够充分和系统化,也没有能从中概括出更多的规律,以形成理论的体系。

(三) 朴学的学风

我国语言学一直有一个朴实的学风,故又称为朴学,这显然是科学的学风。语义并不是虚无缥缈、不易把握的东西,因为联系语音,语音是实的东西;又重例证分析,例证也是实的东西。我们现在对于语义的研究有时倒反有一种畏难情绪,认为意义是不易把握的东西,只有语音才抓得住、摸得着。我想,正是语义比较抽象,才采取朴学的学风,力求科学地说明问题。

朴学研究中并不是就没有主观主义。声训研究自汉至清,一直是在克服音义关系中的主观主义而取得进展的。这种主观主义,正是由于朴学的学风还发扬得不够、重例证的精神还不够才产生的。以为为之,轻易地穿凿附会,实是我

们音义研究中所要切忌的,是历史教训所在。例如大家都认为刘熙《释名》中有相当一部分声训是主观臆断,其实刘熙还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那时的科学水平还没有到那一步,就作一种兴之所至的发挥。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合理的,我更认为其中还有少数是沙里淘金,能够发光的东西。例如他说的“墨,霉也”,这是未曾有人说过的,我们仔细想想,墨字的确常常指的是青灰的发霉颜色,如墨刑、墨面,都不是指黑色。墨字从土,也很怪,因为土壤也很少有乌黑色的。这样,墨字的本义是什么,就向《说文》提出许多疑问了。

我国朴学研究中的另一个缺陷就是停留于实际训诂问题的解决,常常就事论事,追求系统理论的观念薄弱,而语言正是一种体系性很强的社会现象。朴学家的理论阐述也是有的,他们从十分庞大的学问中抽取出几句话,如说“以音求义”,这话就很切要、深刻,实践性也很强,却仍使我们感到理论上的不足。典型的朴学论文如钱大昕那两篇著名的音韵学文章:《古无轻唇音》、《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都在开头用一句话,说出自己的结论,接着便是列举许多例证,例证举完,文章也就完了。这一句结论是颠扑不破的,例证是丰富的,而且人们还可根据他的路子,看到更多的例证来说明他的结论。然而它欠缺理论的阐述,比如何以分化出来了轻唇,分化的条件和规则,语音演变的特点,就都不说了。所以,我国的音韵学研究很精到,但是音位学和语音史方面的理论,就不如西方语言学。其实钱大昕是一个很能思考的人,他是清代寥寥可数研究声母而又有重大贡献的人,他已经有了突破。学术的进步总是循序渐进,很难一下子跨

越几步,学术传统是一个良好的起点,却也有局限性的一面。传统的汉语历史研究往往和复古主义相伴随,忽视现代语言,这怎么能想到音位学等的理论呢。

(四) 东西方语言学的交流 与普通语言学问题

只看到一种语言,就研究语言学,就要受到一定局限。近百年来,出现了世界语言学的大交流,我国语言学从中受到很多启发。现代的许多语言学家,大多曾直接间接地学习了欧洲的语言学,用之于汉语的研究。

我国的语音研究,从六朝开始,受到了佛教传播的影响。接触印度语言,学习印度语言学,进一步明确了声母韵母的分别。后来知道声、韵还有变化发展,这又经过好几个世纪,到宋代以后才逐步明白。明清时期音韵学的重大发展则完全是靠自己的智慧赢得的。我一向认为研究音韵学的人比较聪明,他们研究的东西,虽然常人都说,都用,却又是常人所不知的。欧洲语言学注重语音研究,有他们的文化背景。欧洲分割成许多国家,他们的语系分成许多语种,国家和民族之间交流频繁,语言学中早就盛行了历史比较法,音变问题就十分敏感了。他们是多音节语言,使用拼音文字,语法形态发达,这都促使他们要注重语音的研究,他们也就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就。现在又依靠语音和拼音文字,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创造了语言的计算机输入和输出,这是

极大的成果。

欧洲语言学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语法学。他们的语言有丰富的语法形态,这种严格的语法形态把词法和句法的规则规定得十分严格清晰。这是汉语中所没有的格局。从语音到语法,他们又发展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结合他们的语言发展语言学。当然,其中有许多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从欧洲语言学出发,他们还建立了普通语言学,力图概括一切语言和语言学的本质特征。但是,他们对汉语及汉语语言学的了解是不多的。

我国的语言学从《说文解字》开始,注重语义、词汇及文字的研究,语音研究也很有成就;相对地说,比较漠视语法研究,而且也不够系统,这是由各自在语文实践中所提出的问题不同决定的。

我国的语言学,学习和吸收西方的语法学、语音学,增添了不少东西,如句法学、语音分析、普通语言学理论等。由于他们的东西是从形态发达的语言中概括出来的,一切外国的东西学习过来都必须结合汉语的特点,所以一面是学习的过程,一面也是逐步认识汉语特点的过程。努力认识我们汉语的特点,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是没有异议的。

在东西方语言学的交流过程中,当前有两个问题是比较尖锐的:

第一,音转问题。我们的音韵、训诂、语源研究中,经常涉及音转问题。一声之转,音义相通,从王念孙《广雅疏证》、章太炎《文始》至王力先生《同源字典》,都有大量的音转问题,而提出音转更是从郭璞注《方言》以来就开始了。王念孙

的音转,大家没有提出多少意见;章太炎的音转,大家就有很大怀疑,说他几乎无所不转;王力先生的音转一再表示要从严掌握,要音近的才能转,但是大家也有不少意见。王力先生是通晓西方语言学的,王念孙却全是靠的朴学传统。其实王念孙该书中的三百七十余条音转例,分析起来也几乎是无所不转的。然而这在欧洲的语音学看来,在音理上是通不过的,他们认为语音只能向邻近的发音部位有条件地演变。那么传统训诂中大量的声近义通难道都成了误会吗?这也是不可理解的。这可说是东西方语言学的对撞了。

第二,对我国传统语言学的评价和继承问题。原则上大家都会觉得我们的传统语言学是应该继承的,但实际上是过多地被否定了。例如我国语义、语源学的深入研究是否该予以高度的评价和总结,还是认为对语义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又如对我国声训的评价,从汉代声训到清代以音求义,基本上是主观主义的,还是该看作是我国语言学的精华?再如音义关系问题,是遵循我国“传统”那样,声中有义,因声求义,音义同源,还是接受欧洲普通语言学中所说音义关系是任意性、无理性、不可解释性的?这都是语言学中的重大问题,如果对这些都无视,否定国学中的东西,那么我国的语言学中可以继承的精华,恐怕就不多了。

我国的语言学,长处很突出,缺点也很明显。我们学习西方语言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也要充分扬己之长,避人之短。

50年代,王力先生在学习苏联的影响之下,写出了第一部系统的《汉语史稿》,他主要依据西方语言学的框架来